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善用社会动员的基本经验

刘卓红 魏德阳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000)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善用社会动员方式解决重大问题、化解社会危机,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取得事业成功的宝贵经验。善用社会动员,能极大地唤起全体人民的干劲和热情,增强信心和凝聚力量,从而赢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支持和信任。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对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有效总结中国共产党善用社会动员的经验,使社会动员在新时代得到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新时代 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1)02-0005-10

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社会动员架设了国家治理主体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渠道,确保国家治理主体能够高效地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整合社会资

[收稿日期]2020-1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观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18ZDA002)

[作者简介]刘卓红(1956—),女,浙江玉环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从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形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源,激发积极性和增强胜利信心,从而达到化解社会风险与解决所遇难题的目的。可以说,社会动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家治理主体必须掌握并熟练运用的一项基本能力。

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社会动员的价值和不断在实践中提高社会动员的能力。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有效发动人民群众,科学使用符合不同时代与实践要求的社会动员手段,化解了不同时期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获得成功。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复兴战略大局,赓续善用社会动员,成功化解了各种难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要的历史节点,回顾百年来开展社会动员的实践进程,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善用社会动员取得成功的历史,科学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经验并实现这一路径的新时代传承,对于中国共产党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具有悠久的历史。按照历史时期划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四个阶段。上述四种社会动员既一脉相承,又各具时代特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既是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同时又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要求,领导、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现实的实践当中,完成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

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方式,社会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是党与人民建立鱼水关系的重要渠道。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历史方位中,中国共产党凭借自身出色的社会动员能力,宣传、发动和依靠群众,凝聚力量并树立权威,排除万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一次又一次胜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格外重视社会动员的作用,善用社会动员,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破解革命斗争的难题和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找寻力量支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社会动员当属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在日寇入侵、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动了各民族、各阶级的全体民众参与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逐渐掌握了抗战的主导权,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早在战争伊始,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511},“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480}。全党对社会动员的高度重视不仅为长期抗战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群众力量,还“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意

识,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2]。

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设时期的社会动员在巩固新生政权和维护国家生存的基础上,开始将动员的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从政治动员和军事动员转向经济动员和社会动员,兼具了革命性和治理性的双重特征。根据动员工作的重心不同,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又可划分成巩固新生政权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方式展开了社会动员,维护社会主义政权:首先,通过发动群众,严加清查各类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新生政权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其次,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把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奇迹般地调动了起来”^[3],为社会主义政权巩固赢得了和平的外部环境,更为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迎来了长久和平的环境。最后,通过动员群众进行有效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有经济等手段,确保了经济的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靠的经济保证。通过广泛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4],巩固了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为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大量社会动员方式,在继续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同时进一步将人民群众调动起来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几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面前,广泛运用社会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化解危机的最有效方法。

相较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社会动员是在社会主义遭受到巨大波折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认识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威胁后,重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导向,逐渐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向,彰显出中国制度强大的纠错能力和内含的人性关怀,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上开始从以巩固政权为重心的强制性模式开始向以社会管理为重心的诱致性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社会动员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彻底转向经济建设,其领导的社会动员聚焦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旨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向前发展。随着社会动员理念的逐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社会动员时,将其核心理念定位于“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人民的权益和需求。同时,问题导向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并成为社会动员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动员时,始终以改革开放进程中遇到的社会难题、突发事件、自然灾害为着力点,合理运用社会力量,有效解决已经出现的或者潜在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巨大转型时期,改革开放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事情是最多的,是巨量的,而巨量的事情势必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5]。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一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动员上采用的“政治般狂热”手段,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切实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找寻国家治理

的有效途径,由“能治”转向“善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社会动员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风险由于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叠加、内外风险交织感染等原因变得日益复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否还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否能够继续善用社会动员这一国家治理的有效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

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依然能用、会用和善用社会动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6]3、30、55}的指导思想,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明确要求按照集中领导和统筹规划的原则来使用社会力量,以科学的社会动员方式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组织性调动起来,使人民群众高效地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当中。同时,及时出台多项与社会民生有关的举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其领导的针对疫情防控的社会动员工作能够获得强大的群众力量和民意支持,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取得阶段性胜利。通过抗击疫情阻击战,中国共产党再次证明了在新时代依然具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已经具有了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化解社会突发事件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为进一步推进治理能力实现全能、高效又迈进了新的一步。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善用社会动员取得成功的范例更从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论指导实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有力地诠释了中国制度具有的制度优势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特征,为中国共产党善用社会动员增添了新时代的宝贵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善用社会动员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

通过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四个不同时期中善用社会动员历史的梳理可以得知,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和坚守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学用、会用、善用社会动员,在社会动员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些历史经验作为宝贵的财富,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凝聚力量、化解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资源,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提供了前瞻性指引。中国共产党百年善用社会动员的历史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动员作为影响和改变动员对象看法、认识的一种方式,动员主体的权威和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50},任

何一个国家在开展社会动员时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社会动员的主体,位居领导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成功推进社会动员的活动中,通过自身能力的展现树立起自身的威信和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戴所决定的,在实践中干出来并受到实践检验是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领域掌握话语权和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自身长期的努力,在社会动员中彰显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水平,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信任,“树立了崇高的政治权威”^{[7]64}。同时,崇高的政治权威的确立,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又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意志的认同和服从”^{[7]64}。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领导到位、方法得当,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动员的主体并确保自身在社会动员中的主导地位,势在必行。

2.将“人民至上”的原则贯穿于社会动员工作的始终,从而确保了社会动员价值指向的人民性。人民性既是开展社会动员的初心,也是完成社会动员的根本目标。社会动员的核心要义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这是人民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中的主导地位,并主动支持和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动员工作的基础和关键。此外,“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社会动员时,始终要将“人民的生命至上”和“人民的利益至上”的理念真实地落在实践中,完美构成坚持“人民至上”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从千百万人民群众中产生、成长起来的政党,是党性与人民性高度契合的政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它始终把人民的诉求作为自身工作开展的依据,从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性任务更加艰巨和伟大,这就为新时代如何更高效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动员体系和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社会动员进行国家治理时的“人民至上”原则没有发生改变,其党性与人民性的专有特性也没有发生改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6]9}。正因为社会动员中体现出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完整统一,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社会动员时“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8]51},切实履行其向人民作出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庄严承诺,为社会动员工作的有效开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3.在社会动员中正确处理好国家整体和群众个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协调和沟通,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个体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整体”与“个人”、“国家”与“人民”是社会动员领域的两对重要范畴,分别代表着主导性的主体与参与性的受体。在这两

对范畴中,国家和集体处于主导地位,占据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统辖着人民和个人,对社会动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作为社会动员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也对社会动员成功与否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社会动员时,一方面,必须建构国家集体和群众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确保领导地位之时,要重视社会动员中各方的利益,提供切实可能的条件使其获得真实的参与感;另一方面,必须充分保障群众个体一方的权益,克服在执行中两者之间容易产生的单一性和强制性的关系,避免“在国家控制所有生存必需的资源的前提下,被动员者实际上是没有退出权的”^[9]情况出现。要建构国家整体与群众个体双向融通互动的关系,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在强调集体对社会动员起到的整体推动作用的同时,尊重和重视群众个体的作用,发挥群众个体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尤其是要认识到每一个体作为社会动员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对社会动员起到的要素性功能,其中,优秀个体的榜样作用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社会动员中,通过对重点个体、社会榜样、英雄人物等进行大力宣传,能有效地利用群众个体服务于国家集体,发挥出群众个体解决重大问题上的独特功能。在强调个体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要特别注重和强调党员和团员个体在人民群众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将其树立为群众个体的表率,引领普通个体自觉投入到社会动员工作当中,从而取得理想的动员结果。

4.注重实施传统和现代技术媒体相结合的多种方式,保证社会动员工作的有序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动员手段是动员主体为实现动员目标所采取的影响动员对象的策略、方式和途径”^{[7]25},对社会动员的主体而言,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能更有效地提高被动员者的参与度;另一方面,通过打通信息交流渠道,用最短的时间把党的方针政策在最大范围内传递到千家万户,达到答疑解惑、凝心聚力的目的,从而保证动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手段上的可选择性逐渐增多,主动借助现代新媒体等宣传工具加强意识形态的宣传,现代新媒体已经在社会动员工作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传播和宣传作用。

5.尊重社会动员自身活动的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善用社会动员,引导社会动员并将其控制在合理运行的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因此,社会动员也必须始终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其重要任务就是要着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发动群众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达到化险为机的目的。然而必须看到,“在群众运动中,普通的个体很容易对这个庞大的集团产生过度的信赖感……理性的个体容易失去理性,变得失去责任、暴躁和易受煽动”^{[7]73}。社会动员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会因善用社会动员带来良性的效果,另一方面会因滥用社会动员带来恶性的后果。社会动员必须遵循社会基本运行规律合理使用社会动员手

段,在科学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利用物质激励、理性宣传、模范引导与理论支撑等举措将这种积极性与创造性控制在可控的、合理的限度以内,并随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和引导,从而确保社会动员工作稳定有序地开展。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善用社会动员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在长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治国理政实践中干出来的,是对以往成功实践的科学总结,具有强烈的可信度和鲜明的指导性。对这些宝贵经验加以总结和完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完成两个一百年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不断总结社会动员经验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代和实践的结合,使其呈现出常新常变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指引力,更好地发挥社会动员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中国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10]的显著优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情怀得到最大的彰显和认同。

三、中国共产党善用社会动员的新时代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和中国两个大局,新时代困难与机遇同在。如何破解各种时代难题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牵涉到治理的多个层面。一方面,要在总结原有善用社会动员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社会动员的伟大事业,发挥社会动员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就是要抓住新时代开展社会动员的新特点,通过科学认识社会动员的重要作用 and 更好发挥社会动员的有效价值,实现这一国家治理有效路径的新时代传承。

新时代带来了新实践,必然会对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动员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成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了新的部署,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治理的伟大尝试并已经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效果的社会动员,势必成为新时代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有效路径,其价值和意义愈加凸显。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社会动员的新时代传承,首先需要对新时代的社会动员作出新的理解,面对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风险与难题,在更高层次上善用社会动员应对这些难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必须看到,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新时代的社会动员也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在动员主体、动员动机、动员手段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内容。同时,急剧变革的新时代在给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带来新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开展社会动员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尤其是“随着大数据、信息化、网络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发展,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已发生改变,传统的社会动员治理

手段逐渐难以适应时代之变”^[11]的显著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更高的层次上运用社会动员的方式达到效果的最大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做到实现社会动员的新时代传承,必须根据时代和实践之变对社会动员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探索,寻找切合新时代要求的社会动员的机制、路径和方法。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动员在新时代的传承,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动员进行完善和建构。

1.要以科学思维正确引导社会动员。马克思主义认为,思维影响实践,只有在科学思维指导下的实践才有可能成功的实践。在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并出现了新的实践诉求,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思社会动员,以科学的智慧解决在新时代进程中社会动员遇到的新问题和提出的新诉求。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社会动员工作中除了要坚定不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6]18},更要以科学思维为指导,加快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和机制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代开展社会动员的新特点作出全面的把握。勇于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动员实践中实现方式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有效利用社会动员的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完成国家发展目标的关键一环。

2.要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通过提高党员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使党在各个领域中的领导作用达到充分的发挥。新时代的社会动员如果还仅仅依靠政党单方力量的推行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在形成强大民意认同和广泛社会认同的基础上树立党的威信,重塑党员的形象,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打心里信服和自觉地认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更好发动群众、引领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和队伍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8]49}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新时代、凝聚民心再出发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在新时代的社会动员中,还应当注重用严格的作风建设维护党的形象,注重用坚强的组织堡垒惩治腐败、纯洁队伍,以灌输先进文化和坚持科学精神提高党的治理能力,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切实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

3.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完善社会动员领域的法律监管。“社会动员是一种强大的公共权力,赋予了动员者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权力,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带有一定的压迫性和扩张性。”^{[7]126}社会动员一旦使用不当就很容易使这种公共权力变质,带来巨大的反噬。此外,新时代的社会动员还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状况,极易形成法律监管的漏洞,如随着社会动员的多样化主体、多路径手段、多目的动机和多评价的社会动员结果的变化,在推进社会动员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使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及时跟上社会动员机制的快速变化,由此造成现有的法律法规与新时代的社会动员

在某些领域相脱节,加大了法律监管的难度。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法治建设,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12],将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当中,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 and 法律的监管,从而为善用社会动员提供合法性依据。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还应及时出台和完善社会动员领域的法律法规,填补社会动员领域的法律漏洞,对社会动员的主体、动机、手段、结果等进行监管,以防不法分子滥用社会动员来危害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制度。

4.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记为人民的宗旨,通过建构合理的奖惩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社会动员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动员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最终取决于这种社会动员是否做到以人民至上,是否做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要达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使其主动参与到社会动员实践中的目的,就必须保证被动员者在动员过程中的各种合法权益,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将党自身的权益和被动员者的权益有效结合,从而保证社会动员取得成功。所以中国共产党在运用社会动员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原则,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不断完善国家治理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根据社会发展建构合理的奖惩机制,采用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在社会动员中的获得感,从而提高社会动员的效率。

5.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作用,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扩大社会动员的广度,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动员的影响。新时代是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因此,更好利用互联网构造社会动员新格局是国家治理的新任务。作为当今时代的“最大变量”^[13],互联网无所不在、涉及面广,尤其吸引广大的网民特别是青少年,并深刻改变了国家舆论宣传的方式。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构造社会动员新格局,是当前开展国家治理的新任务。中国共产党要想牢牢掌握互联网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的作用,认清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要主动靠近、学习互联网技术,提升自身运用互联网的能力,从而发挥互联网媒体更好实施社会动员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还应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提高自身在互联网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占据舆论的制高点,为高效使用社会动员提供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依靠自身的不断壮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坚持善用社会动员,保证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前行。作为一种持久演进的动态机制,社会动员不可避免地会伴随实践的发展而出现新的内涵,这就对中国共产党赓续善用社会动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推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完好梳理社会动员的历史,还要认真总结长期实践中的社会动员的宝贵经验,清楚认知社会动员在新时代的传承径路,不断完善社会动员的举措和措施,使社会动员真正起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助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之所以选择社会动员就在于它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形成社会的合力;在百年实践中对社会动员从一种朴素情感到自觉认知,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动员认识的不断深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善用社会动员经验的总结,能为中国之治提供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价值,使社会动员真正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的可行方案,成为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聂云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J].党史博采(理论),2016(6):8-9.
- [3] 陈晋.1949—1976:怎样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J].湘潮,2019(6):17-22.
- [4] 李强.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23-30.
- [5] 吴忠民.社会矛盾新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202.
- [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7] 贺治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9.
-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孙立军,晋军,何江穗,等.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88.
- [1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
- [11] 王学俭.中国道路与社会动员[J].江海学刊,2020(3):52-53.
- [12]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4.
- [13] 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创新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之五[N].人民日报,2013-09-04(005).

(责任编辑:杜娟)

Main Abstracts

The Basic Experience of Social-Mobilization-Proficient CPC from Its Centennial Founding

Liu Zhuohong , Wei Deyang

(School of Marxism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510000 , China)

Abstract: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 the CPC has made good use of social mobilization to lead the people of whole country to solve major problems in each period and resolve social crises , and has won great victories one after another. This i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publicizing and mobilizing the people to achieve success in the centennial revolution ,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Making good use of social mobilization can greatly arouse the energy and enthusiasm of all the people ,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and strength , so as to win the masses' support and trust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PC's national governance level and ability. How to effectively sum up the experience of the CPC's proficient social mobilization so as to carry out social mobilization the effective way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and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 it is very important.

Key words: the CPC; social mobilization; new era; basic experience

Novelty Hunting and Wasting: Natural History Modality of Consumerism and Its Critical Path

Bao Dawei

(School of Marxism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Consumerism remains a morally suspicious "achievement" in the progres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 national economists promised that consumption would bring personal freedom , while naturalists promised that science would bring an equal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man and nature , the market and science captured by capital begin to move towards alienation and surplus , and become the tools to consume nature and man himself. In its contemporary symptoms , including curiosity , rationality , freedom , mutual benefit and discours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ideology of consumerism , the subject and its concept have been commercialized and reconstructed , and nature has become the object of exploitation under the skin of science. Man and nature are not the objects of unlimited depletion or consumption , but to save them , we should not rely on weak ethical criticism , but start from the historical "mother" of consumerism , and build a real rational life paradigm and production mode concerned about the common destiny of mankind.

Key words: consumption; production; aesthetics; nature; object

Reshaping the Connection Mechanism between Law Creation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in China

Qian Dajun^{a, b} , Su Hang^b

(a.Center for Judicial Data Application , b.School of Law , Jilin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12 , China)

Abstract: Legal norms are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judicial activities , and legislation should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judicial rules. However , on the one hand , our legal system can not provide sufficient trial basis for the court , and on the other hand , it lacks practical regulation on the judicial rules made by the court itself , resulting in the fracture between the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 this problem results from the defects of the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in its input activities ,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standard and legitimacy of the judicial organization , and the coordina-